

# 面向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的责任共同体构建

潘建红<sup>1</sup>, 李 苗<sup>2</sup>

(1. 北京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2.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 101404)

**摘要:**文章根据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主体特色,从根源上厘清各类主体应当承担的治理责任,即公众强化风险意识、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责任感、企业加强自我约束、政府加强制度规范以及媒体强化职业伦理。同时,结合当今技术伦理风险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深入剖析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的责任伦理困境,即责任意识缺位、责任权利越位、责任行为错位。由此,提出将多元治理与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相结合的建议,以政府为引导,统筹协调公众、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治理主体,着力搭建“共识、共赢、共治、共享”的责任共同体,多元治理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以期能够科学防范规避伦理风险,稳定社会数据信息安全形势。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多元治理;责任共同体;信息安全

[中图分类号]B82;TP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6-0018-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6.003

## Construction of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for Governing Ethical Risks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Pan Jianhong<sup>1</sup>, Li Miao<sup>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9, China;

2. Beijing Jingbei Vocational College, Beijing 10140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ain subjects'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ethical risks governanc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that various subjects should bear are clarified, which includes strengthening public risk awareness, enhanc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ong social organizations, promoting self-restraint within enterprises, reinforcing institutional norms through government measures, and emphasizing professional ethics within the media sectors. Combined with the escalating ethic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the ethical dilemmas—specifically the absence of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the offside of responsibility rights and the dis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in responsibility risk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re deeply analyzed. Meanwhile, suggestions of combining multi-governance with the governance of ethical governance in big technology is put forward that the government leads the coordinating and harmonizing efforts of various governance entities including the public, social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s, and media, and that a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consensus, win-win cooperation, shared 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Through diversified governance, it aims to scientifically prevent and mitigate ethic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big data technology, thereby stabilizing the security of social data and information.

**Key words:** big data technology; ethical risk; multipl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information safety

收稿日期:2023-05-21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DSZKZ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12-0913);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项目(2023SZA008)

作者简介:潘建红(1972—),男,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科技伦理与科技文化;

李 苗(1997—),女,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及“加强个人信息保护”<sup>[1]</sup>。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主体逐渐由社会管理者转变为广泛的社会大众,公众、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媒体等都成为了大数据时代下数据信息的主体。但当前部分公众、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数据主体由于缺失责任意识、伦理道德及职业素养,采用了各种“非善”“非正义”的方式争夺数据资源,导致伦理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如罔顾道德规范获取他人隐私信息,以谋求高额经济利益等。此类技术伦理风险问题愈演愈烈,对社会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将多元治理这一概念引入技术伦理风险治理,让公众、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媒体等大数据主体共同参与到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当中,以此形成高度的责任共识,增强数据主体的伦理道德,构建多元高效的治理责任共同体,从而加快推进大数据发展规范化、法治化,有效化解技术伦理风险,确保大数据技术有序健康发展。

### 一、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中的责任分担

“大数据”是以“互联网+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基础,经历数字化、信息化深度发展而积累起来的海量数据资源,包括数字、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sup>[2]</sup>。公众、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媒体等数据信息主体在网络空间进行数据活动的过程中长期处于相互交织、混杂甚至错乱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伦理风险的治理。康德提出,“责任是尊重道德法则的必然行为。”<sup>[3]</sup>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源上着手,回归数据信息主体,深入探寻大数据伦理风险治理中各类主体的责任分担。

#### (一)公众:增强风险意识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公众在广义上是指借助大数据技术参与网络活动、获取数据信息的网络用户。公众作为运用大数据技术最为基础

的个体,以其范围广、体量大等鲜明特征处于大数据环境之中,日常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之中。当前,关于网络用户数据信息泄露的问题日益严峻,出现了大数据时代的典型现象——“隐私已经死亡”<sup>[4]</sup>,公众的个人隐私权利遭到了非法侵犯。因此,在构建大数据伦理风险治理责任共同体的过程中,公众作为最基础的组成单元,应当承担起相应责任,努力增强风险意识。一方面,要提升数据信息素养,强化防范数据信息泄露风险的能力,学会正确认知并辨别数据信息的真假,提升自身独立思考、理性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数据信息的产生、接受、传播过程中,公众应当做到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自觉主动消除侵犯隐私权的风险隐患,依法捍卫自身数据信息隐私权,同时要坚决杜绝非法获取他人隐私信息,严格遵守数据信息的相关道德与法律规范。

#### (二)社会组织:强化社会责任

社会组织作为大数据时代下各项网络社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是公众、企业、政府、媒体之间的重要桥梁。其狭义上是指与大数据信息技术相关的协会、智库等专业性社会团体,具有与其他主体相区别的专业性、公益性特色。社会组织在伦理风险治理中所承担的责任主要表现在运用大数据技术提供数据信息服务时,妥善规避数据滥用、隐私泄露、数据鸿沟等问题。从整体来看,社会组织在构建伦理风险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应当更多关注自身的社会责任,增强数据技术伦理责任意识与遵守数据信息道德规范,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力量的显著优势,及时关注跟踪大数据技术发展前沿动态,加强分析研判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切实维护数据信息权益。具体而言,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条件,搭建大数据技术伦理交流平台,广泛宣传数据信息使用、传播等网络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 (三)企业:提升行业自律

当前,完整成熟的数据信息产业链条在大数据技术领域中逐渐发展壮大,汇集着各式各样与大数据相关的企业。这类企业主要包括网络运营商、分析数据的科技组织、互联网企业等,往往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直接目的而忽视他人隐私信息权利。“信息隐私成为身份盗窃的另一面”<sup>[5]</sup>,这种非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作为大数据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互联网企业要把握好谋求经济利益与遵守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平衡。因此,企业在参与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过程中应当增强行业自律,加强自我约束与主动利他,严防技术异化带来的罔顾伦理道德的问题,强化风险治理的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及合作意识。同时,企业要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技术伦理规范,减少对各类主体数据信息利益的侵犯,主动承担参与治理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的社会责任,维护技术主体信息安全,进一步提升企业公信力,为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的治理贡献更多力量。

### (四)政府:完善制度规范

在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逐步升级、部分主体信息安全遭到严重侵犯、社会信息资源面临不公平分配的大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存在着制度不够健全、监管不够到位等问题,政府作为主管部门,要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持续完善科技伦理风险治理的制度规范,建立适应当前大数据技术发展需要的长效机制,健全完善信息共享、沟通交流机制,统筹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要强化风险监管,以互联网秩序监管为重点,严格规范数据中间商、网络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主体的行为,大力遏制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等不良现象的发生,有效解决数字鸿沟、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等典型问题。健全完善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评估机制,加快推动大数据技术

伦理风险治理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水平,督促做好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工作,保障大数据技术环境井然有序,确保科技持续向善及规范化发展。

### (五)媒体:强化职业伦理

媒体主要指在大数据空间中区别于公众之外的专门从事信息传播、具有广泛社会公信力的信息传播群体组织。随着数据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手机等多种新型媒介产生并逐渐成为媒体传播信息的技术中介,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专业力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过程中,媒体从业人员要自觉遵守职业伦理,严守职业底线,充分发挥媒体优势作用。一方面,要发挥信息传播的强大作用,做到信息传播的公正、真实、客观,积极引导社会公众理性对待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宣传数据伦理知识,唤醒公众增强社会道德认知,努力缓和数据信息分配不公平带来的矛盾。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本职工作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坚决杜绝为谋求经济利益而罔顾自身伦理责任的行为,扎实做好对社会舆论的监督引导,助力营造健康良好的大数据网络信息环境。

## 二、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的责任伦理困境

在多元主体视野下,强化大数据主体的责任担当、实现责任同构成为治理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的时代需要与必然选择,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仍面临着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致使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陷入责任伦理的困境。

### (一)责任意识缺位

大数据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是诱发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的深层缘由。在运用大数据的过

程中,不同层次的组织与用户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变得淡漠,道德的约束力逐渐下降。“因为缺乏对自利的理性对待,也就缺乏‘自利’与‘约束自利’的辩证统一,一旦遭遇利益的引诱,‘为他’责任就容易丧失而倒向一种极端化的‘无约束自利’。”<sup>[6]</sup>数据信息的巨大价值,让网络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各类主体竞相争夺,从而导致各类主体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利益争执。网络运营商、数据中间商等通常以自我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技术优势,搜集网络数据信息,肆意侵犯他人隐私权,损害社会信息安全,直接造成网络用户与互联网企业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例如,2022年11月,社交软件脸书(Facebook)因为泄露5亿用户的数据信息(包括用户名、位置、生日、电子邮箱等个人信息),严重损害了该社交平台用户的个人隐私权,被欧洲监管机构处以高额罚款。从根源上看,发生信息泄露问题的本质原因在于当前各类主体仅从自身利益出发,主体责任意识匮乏,缺少伦理道德上的自我约束,社会责任感、积极互利与积极利他意识有待增强。

## (二)责任权利越位

大数据信息的利益相关方,如公众、社会组织、媒体等,在大数据信息的生产、搜集和利用过程中,共同组成了一个具有一定交叉和混合的责权共同体。当针对权利的社会约束力减少、监管弱化,再加上利益诱导,责任主体往往很有可能超越自身权利行事,滋生严重的伦理风险问题。“开发者潜在的价值偏见,加上智能算法规则存在的程序、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等技术黑箱缺陷,对社会公平形成挑战。”<sup>[7]</sup>大数据技术使用混乱及权利的滥用、膨胀、扩张现象泛滥,引发了技术伦理风险治理中责任权利越位的深度困境。如,个别媒体在网络数据信息使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责任权利越位现象,不

惜泄露新闻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信息来增加新闻曝光度、谋取经济利益,这就导致知情权的肆意膨胀。更有甚者,借助报道形式、夸大用词,不断营造声势、煽动公众情绪,滥用自身话语权。例如,在2021年11月,“网易体育频道”账号发布了一条带有“全红婵遭队医警告”话题的微博,在24小时内引起了2亿阅读量和3000多条评论,但其导语内容却与标题大相径庭,严重扭曲事实真相。究其原因媒体为了点击率和浏览量不惜夸大甚至歪曲事实而选用误导性极强的新闻标题。媒体虽依法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但罔顾自身职业伦理道德,通过不良手段作出大幅超出自身职责的事情,造成了知情权、话语权的严重越位,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在大数据信息庞杂的时代下形成了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的责任越位困境。

## (三)责任行为错位

当前,政府、社会组织等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责任主体对此类风险事件的规避方式与治理措施,往往是在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问题发生之后,同时缺少全面高效的数据安全监测与防范、评估的制度规范以及应急预案机制等,导致相关风险问题的发生与各类主体所实施的治理行为之间存在着时间及空间上的错位。不仅如此,各类数据信息主体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在面对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时相互推诿,深受利己观念的诱导,数据信息主体的责任行为存在着利己高于利他的错位,将个人利益摆在他人、社会集体利益之上,极易由于信息不对等而引发利益纷争,进而演变为风险应对行为的错位,其本质上是各类主体未作出与自身伦理责任相匹配的风险应对行为,存在着严重的责任行为错位问题。例如,2021年1月,北京某大数据公司在没有取得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向下游多家信息服务公司出售受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隐私信息,导致大范围的用户隐私信息



泄露,事后该公司法人受到严肃的法律制裁。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是主体之间的伦理风险应对行为未能形成科学高效的协同配合。《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伦理先行的治理要求,亟需通过构建风险治理责任共同体,厘清数据信息主体责任,确保做到源头治理,提前做好科技伦理风险的防范、评估工作,搭建责任同构的治理格局,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实施治理的方式有效防范规避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

### 三、搭建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多元共治的责任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sup>[1]</sup>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基础,顺应当前信息资源共享的时代特色,将多元治理引入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中,以政府为引导,统筹协调公众、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强化多元主体的责任担当,着力搭建“共识、共赢、共治、共享”的责任共同体。

搭建多元共治的责任共同体是有效规避大数据发展带来的技术伦理风险的实践途径。实现大数据主体多元治理,要从思想、目的、方式、结果四个维度出发,以共识、共赢、共治、共享为理念,严格遵循共识、共赢、共治、共享的实践逻辑,以形成责任共识为思想基础,搭建多元共赢的责任共同体为目的,运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共治方式,采取能够激发各个主体最大效用的实践举措,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规避技术伦理风险的能力,最终实现风险治理成果多元主体共享的美好愿景。

#### (一)共识旨向:形成责任共识

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丛生,各类主体均显

露出对风险治理的强烈诉求。构建多元共治的大数据伦理风险责任共同体,促使各类主体参与到风险治理中来,关键在于形成责任共识,进一步筑牢思想意识基础。

共识即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指某一群体在朝着共同的实践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对某一事件或问题所形成的广泛一致、普遍认同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观念。“共识的形成,不是对公众意见的同一化过程,而是对公众意见的凝练和提升过程。”<sup>[8]</sup>形成责任共识,能够有效规避利益冲突,汇聚各方力量,助推事物发展。在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视域下,形成责任共识,能够强力唤醒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强化主体的参与意识、合作意识、隐私保护意识等,进一步明确责任定位,有效缓解各类主体之间为争夺大数据信息资源而引起的利益冲突,引导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到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中,这样能够从思想根源上有效应对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

#### (二)共赢旨向:搭建多元共赢责任共同体

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把控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sup>[9]</sup>。在多元共赢旨向下,努力将大数据伦理风险治理中的多元主体统筹整合,以责任为导向,以利益为驱动,统筹搭建平等协商、多元共赢的责任共同体,是达成共识后要实现的治理目标。

亚里士多德指出,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共同的伦理取向与共同的利益诉求的人的生活方式”<sup>[10]</sup>。共同体也是“基于人类本能的中意、习惯的适应和共同的记忆等自然意志,在血缘、地缘、精神层面形成共同行动和融洽情感的有机统一体”<sup>[11]</sup>。由此,从其本质来源上看,共同体指的是一定的组织成员,例如经济主体、社会主体等,形成的一种以分工协作为组织方式、以实现共同利益为根本目的的群体组织。结合当下

背景,在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视域下搭建责任共同体,具体指向公众、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媒体等主体,在达成责任共识之后,通过协商分工、整合资源建立的共同价值目标,即构建多元共赢的责任共同体。

在责任共同体中,治理主体能够强化责任担当、有效化解利益冲突,最终实现多元共赢。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平等协商,能够促使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利益冲突最小化,达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综合平衡,努力实现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下多方利益相关者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共赢局面。

### (三)共治旨向: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良好机制

大数据为实现公众、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媒体等共同构建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多元治理格局提供了技术支持。多元主体运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实现相互协作,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促使各类主体广泛参与到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过程中,通过健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沟通交流机制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更好地助推大数据伦理风险多元治理责任共同体的构建。

共治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是指公众、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媒体等主体,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共同参与治理。共治遵循“公开、互动、包容性、尊重民意等基本原则”<sup>[12]</sup>。在多元治理视域下,社会事务的治理手段是多样的,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治理主体应各自彰显特色、发挥优势。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同样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结合大数据技术,通过建立畅通高效的信息共享、沟通协商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公众、社会组织、企业、政府、媒体等多个主体具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在此基础上,多元主体就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问题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工作流程都向利益相关者公开

信息,确保公平正义,在此基础上,健全完善广泛的沟通联系渠道,确保所涉及的每一位利益主体都能够自由表达个人诉求,并通过联系各方的协商机制,实现沟通、交流、协商、意见整合,最终达成利益共识。例如,政府努力做好管理与服务工作,运用行政手段为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营造宽松健康的治理环境;社会公众自觉增强责任意识与能力。由此,社会成员共同建立维护伦理风险多元治理体系,促使技术伦理风险得到有效化解,最终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有治理资源、获得治理利益。

### (四)共享旨向:实现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成果多元主体共享

共享是指在具有责任共识的基础上,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促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共同的责任意识、多元共赢的目标指向、共同治理的有效机制都是实现共享的基础。治理成果由各类主体共享是推动共识、共赢、共治的激励机制,也是风险治理的结果导向。共享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建立在思想共识、责任分担基础上的一种科学有序的利益分配。

构建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的责任共同体,以形成责任共识为基础,通过数据信息共享、沟通协商等多元高效治理机制,最终减少大数据技术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共同营造良好有序的大数据市场环境,推动大数据技术健康发展,防范规避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保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保障各类主体都能够平等公正地享有大数据治理责任共同体带来的治理成果,从而实现大数据治理成果多元主体共享。

## 四、结论

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为公众、社会组

织、企业、政府、媒体等主体进行相应社会活动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暗藏着数据信息隐私恶意侵犯、利益分配不公平等伦理风险。此类伦理风险问题,导致了严重的责任伦理困境,包括责任意识缺位、责任权利越位、责任行为错位,并危害社会的安全稳定。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认为,构建多元治理责任共同体能够有效应对大数据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将多元治理与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紧密结合,按照思想、目的、方式、结果的实践逻辑,遵循共识、共赢、共治、共享的价值理念,以形成责任共识为思想基础,搭建多元共赢的责任共同体为目的,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共治方式,经过沟通交流、平等协商、意见整合达成利益一致,采取能够激发主体最大效用的实践举措,最终实现科学防范应对大数据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成果多元主体共享,确保社会数据信息安全。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
- [2] 潘建红,潘军. 大数据时代个体数据理性化悖论与消解[J]. 甘肃社会科学,2018(2):45-50.
- [3] [德]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17.
- [4] Varney C. The death of privacy? [J]. Newsweek,2000(26A):78-79.
- [5] Floridi L. The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informational privacy [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05,07(04):185-200.
- [6] 肖祥. 责任伦理的困境与出路[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1):63-70.
- [7] Veale M, Binns R. Fairer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real world: mitigating discrimination without collecting sensitive data[J]. Big Data & Society,2017,04(02):1-17.
- [8] 刘兵,江洋. 对共识会议之“共识”的反思[A]//中国科普研究所(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中国科普理论与实践探索:2010 科普理论国际论坛暨第十七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论文集[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6.
- [9]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
-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读本[M]. 邓安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87.
- [11] [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8.
- [12] 马海韵.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37-145.